

《祖国在我心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抢救国宝

主 编 张 鹏
任学周
编 委 杨保申
郭 胜
张惠英
刘志明

丁 7 04 / 17

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责任编辑:蒋琼娜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余景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抢救国宝/张鹏,任学周主编.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11

(祖国在我心中: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ISBN 7—5015—1177—2

I. 抢… II. ①张…②任… III.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读物

IV. G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383 号

《祖国在我心中》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抢救国宝

张 鹏 任学周 主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27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6 次印刷

35001—4100 册

ISBN 7—5015—1177—2/G · 456

定价:6.00 元

目 录

敦煌的守护神

- 常书鸿献身敦煌艺术的故事…………… (1)

费尽心血为文化

- 张伯驹赤心护国宝的故事…………… (10)

理想的归宿

- 文物、图书收藏家周叔弢的故事…………… (17)

一息尚存 决不放下

- 郑振铎保全民族文献的故事…………… (23)

目的是为了抢救

- 邓拓收藏与研究古代书画的故事…………… (31)

一生辛劳 成绩斐然

- 王冶秋献身文物事业的故事…………… (39)

丹甲青文弥复光

- 甲骨学家胡厚宣的故事…………… (47)

研究整理国故 鉴赏考据真伪

- 鲁迅与文物的故事…………… (55)

一生著书为国家

- 藏书家孙广庭的故事…………… (61)

报国有心的出版家

- 张元济抢救整理国故的故事…………… (69)

终身的追求

- 前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的故事…………… (77)

功载史册 不可磨灭

- 故宫博物院奠基人易培基的故事 (85)

千辛万苦 尽职尽责

- 保护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的故事 (91)

历经艰险终无悔

- 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的故事 (98)

鲁迅身后事

- 保存鲁迅遗稿、藏书和故居的故事 (108)

八百年经卷脱险记

- 八路军救护《赵城金藏》的故事 (118)

商代都城之谜

- 安金槐挖掘古代城堡的故事 (126)

盟誓遗物见天日

- 发现和整理侯马盟书的故事 (136)

钱币天地有作为

- 邱思达收藏古币的故事 (144)

金石志趣 学人风范

-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与《金石录》的故事 (151)

独具一格天一阁

- 明代藏书家范钦的故事 (162)

状元的功业

- 毕沅保护关中古迹的故事 (169)

历藏宝盘 终献国家

- 刘铭传及子孙与虢季子白盘的故事 (174)

身处逆境抑强暴

- 翁同龢保护明代诰敕的故事 (178)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 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的故事 (183)

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献身敦煌艺术的故事

敦煌，这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名字，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那些坐落在敦煌附近的洞窟群珍藏了无数艺术瑰宝，可以称得上是东方艺术史上最宏大的古代艺术宝库。

然而，近代以来，这座历时千年营造的佛教艺术宝库受到了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洞窟被流沙所掩埋，壁画剥落、崩塌，石窟中的文物被任意掠夺，其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就在敦煌的“光芒”渐近消失之际，一个人毅然挺身而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敦煌的复兴事业。他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常书鸿。

常书鸿出生在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在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他从小便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22岁的常书鸿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人间“艺术天堂”——法国巴黎。当时，他如醉如痴地研究西洋的美术，先后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保世罗高等艺术学院学习，他的作品曾在展览会上获了奖。

塞纳河畔景色宜人，多年来，常书鸿养成了在这儿散步的习惯。一天，他在塞纳河畔浏览旧书摊，忽然发现了一本敦煌画集，他立刻被那些优美的图画吸引住了。这是一个多么惊喜的发现啊！他爱不释手地翻看着。半个钟点、一个钟点过去了，这时，晚秋的巴黎，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塞

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地浓起来了，是收拾旧书摊的时候了，常书鸿仍恋恋不舍。书摊主人告诉他，巴黎的奇美博物院有许多敦煌的资料。

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就到了奇美博物院。在这里他发现，用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都显示出了先进的水平。

从此，常书鸿年轻的心开始从西洋转向自己的祖国。那时，中国正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他怎能不忧心如焚啊。他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在法国住了10年的常书鸿，结束了在艺术上彷徨的时期，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这时他也从心底里感到，祖国艺术无疑在世界艺术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他决心要很好地汲取古典艺术的精华，并且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

1942年，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去敦煌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40年代的中国，满目疮痍。要到敦煌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历史上有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常书鸿想到他们所经受的各种难以名状的人间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验，想到他们以自己的忠贞和毅力创造的被千古传颂的业绩，便暗暗下了决心：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

库，宁愿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到敦煌去一开始就遭到种种冷遇。在繁华的巴黎，常书鸿是里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协会的会员，过着非常安定和舒适的生活。而今，他抛弃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要到荒无烟火的、只有流浪汉才去的敦煌，就更是非平常之举了。但他立志去敦煌的决心丝毫未变！他决定开个人画展，卖家俱，典当行李，为到敦煌去筹措旅费。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6人，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这是一次艰难的敦煌之行，从兰州到敦煌，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三郡。沿途所见，满目凄凉，到处充满贫穷、饥饿、荒凉、颓败。

出了嘉裕关，到安西，再往前连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

常书鸿一行换乘“沙漠之舟”——骆驼行进，开始了敦煌之行的最后旅程。骆驼缓缓地在沙漠中行进，时间也随之在流逝。夜晚的沙漠，繁星点点，空旷无边，万籁俱寂。

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山峰上升起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千佛洞。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纷纷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奔去。

敦煌，是从汉代开始兴建的。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隘重镇。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这里已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进

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了。敦煌著名的石窟群名为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到唐代立莫高窟碑时，已累建大小石窟1000多个，虽经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及人为的毁损，仍有数百个保存较为完好的洞窟。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石窟中，包括了魏、晋、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各代的壁画、彩塑。洞窟的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局，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都体现着4世纪到14世纪艺术匠师们的天才、智慧和呕心沥血的劳动。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展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艺术传统，又包含了在丝绸之路之所吸收融化的外来文化，表现出了敦煌独特的风格。它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产。

置身于这样伟大的艺术宝库里，常书鸿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多年的海外漂泊，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艺术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的灿烂的古代艺术却知之甚少。今天，面对祖先遗留下的珍宝，他才如梦方醒，追悔莫及。

这时的敦煌艺术宝库，已遭到严重的破坏。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遭受到一场帝国主义的疯狂的劫掠。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珍视。就在常书鸿一行初到此处时，牧人在窟前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的人夜宿的地方，在那里做饭煮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更无人研究，无人宣传，仍在遭受大自然和人为的毁损。

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常书鸿，为使敦煌石窟不再受损，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决不让这举世之宝再遭受灾难了。

很快地，常书鸿就投入到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中。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莫高窟开凿于沙漠之中，流沙埋淹，风沙侵蚀，长年累月地闲置着，大有濒于倒塌的危险。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虽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常书鸿和他的同伴工作情绪都很高涨。他们尝试着流水冲沙的办法，雇了少量民工，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把下层窟洞的积沙用水推送到一里外的戈壁滩上。

为了保护和修复莫高窟，他们从植树入手，阻挡土沙崩塌。为了阻止沙土流入洞窟，他们还在周围建造了长达2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边。

敦煌的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莫高窟是陆中之岛，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必须到15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搞到。没有床，用土砌成砖状，垒成台子，铺上草席就是床。没有电灯，只能用石油灯。吃饭也很简单，经常是面条就咸菜。

莫高窟的水是从30公里以外流来的，水中含有矿物质，太阳一晒马上就起化学反应，变得非常苦涩。因此，每天常书鸿他们都在太阳升起之前去井里打水，然后把它贮存在器皿里，这样一天的饮水便有了着落。

莫高窟是沙漠中的孤岛，看病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一旦出现急性病人就更不好办。在新中国成立前，常书鸿的二女

儿得了急病，5天以后她就死在了莫高窟。研究所的人们在他的女儿的坟前献了花圈，上面写着“孤独贫穷的人们敬赠”。

有一次，常书鸿的妻子得了急病，病情危急，常书鸿请人赶着毛驴去请医生。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经过精心治疗，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而最严峻的考验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寂寞。在这个周围4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伴随着他的是缕缕的思乡忧愁。

著名画家张大千曾到敦煌“深山探宝”，临走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1943年的秋天，常书鸿的第一个妻子在他的不断鼓动下来到了敦煌，当她看到这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时，产生了很大兴趣，立即参加了研究所的临摹复制工作。但是，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在时间和艰苦生活的考验面前，她最初的兴趣渐渐消失了。对这种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开始不满和发牢骚，终于有一天，丢下了丈夫和两个儿女不辞而别。

常书鸿尽力找了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赶她，但毫无结果。在途中，他饥饿、愤慨、疲劳交加，终于从马背上昏倒摔下来，幸而被人发现，把他护送回敦煌。迎接他的，是女儿凄惨的哭嚎声……

此时，研究所的经费迟迟没有汇来，常书鸿打电报责问教育部：为什么让我们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孤岛上，半年多时间分文不给？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到重庆，向公众控拆你们。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经费才寄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5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来了
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他们把石窟移
交给县政府。

日本投降后，一些职工想到可以和敌占区的亲属团聚了，
便无心再呆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都相继辞职离开了。同伴
们的离别，对常书鸿的触动很大，他也一次次想到自己是一
个生长在西子湖畔的南方人，在敦煌不但落得妻离家破，还
不断遭受种种打击。

是留还是走？多少个月明星稀、万籁俱寂的深夜，他在
苦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每当想到离开这里的时候，脑海中
总是浮现出那一幅幅丰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雕塑。几
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的艺术作品留下了他的辛勤汗水，而
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的环境中给了他欢乐和欣慰。他凝望
着敦煌石窟，壁上的飞天仿佛悄声向他诉说：“你夫人离你而
去，但你决不能离我们而去，决不能离敦煌而去！”

时间在流逝，莫高窟风铃的叮当声不停地在召唤：“叮当！
叮当！”

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

心情稳定了，事业心愈加强烈。这时，从重庆和成都又
来了一批青年美术工作者，协助常书鸿工作，其中有位叫李
承仙的女士，后来成为他的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在常书鸿
的带领下，大家集中力量把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都临摹下
来。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劳动。洞窟中光线暗，没有梯架设备
和照明器材，特别是临摹窟顶画时，头、脖子和身体都几乎
成了90度的直角，经常会头昏脑胀，特别是冬天，又黑又冷，
颜料凝结，手脚僵硬，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几年内，他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共 800 多幅图画。

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发布以后，经费无着，一些职工纷纷率眷南归，最令人痛心的是眼看石窟在流沙的侵蚀和堆压中日渐坍塌。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力量，常书鸿孤军作战。在孤苦无助的沙漠中，他想到了向人民大众呼吁，于是振作精神，开始写《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文章刊出后，受到了祖国各地读者的支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分崩瓦解。国民党在溃逃前威胁常书鸿，要他把全部敦煌摹本运往台湾，被他断然拒绝。

1949 年 9 月，敦煌——这座戈壁滩上的古城终于解放了。人民政府对敦煌千佛洞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常书鸿又全身心投入到了敦煌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常书鸿经受了許多磨难。

“常书鸿的敦煌保护和研究是阴谋。敦煌艺术是毒杀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比枪炮更危险，罪恶更深重，这一切的元凶就是常书鸿。”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向他扑来。他被批判、被揪斗、被调出研究所达 4 年之久，饱受与家人离别之苦。

每逢他夜不成寐时，敦煌风铃的声响便远远传来，给他以希望，也促使他振作起来。

后来，每当回忆起往日艰苦奋斗的历程时，常书鸿都百感交集：

“人生是战斗的连续。克服了一个困难，另一个困难马上就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绝不后退，无论困难有多大，我都将战斗到最后。”这便是常书鸿的信条，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在敦煌度过了 30 多年。

在这一步一步的人生历程中，常书鸿用生命守护着敦煌，使敦煌再生，这是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人生！

常书鸿是真正的“敦煌人”！

费尽心血为文化

——张伯驹赤心护国宝的故事

张伯驹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还是著名的诗词家、书法家和戏剧家。他文思敏捷，知识广博，书画琴棋无一不通，作诗填词备受推崇，谙熟历史掌故，长于戏曲文艺。

张伯驹一生酷爱书画，广泛搜集，保藏珍品，为保护祖国文物，尽心竭力。解放前，在国宝被大量盗运外流的情况下，他以赤诚的爱国之心，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典当借贷，收购文物，使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得以保存。

西晋陆机（261～303年）手书的《平复帖》是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无论从《平复帖》作者陆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和书法成就来说，还是从史学和关于造纸、笔、墨等等考古方面来说，它都是稀世之珍。

30年代初，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那是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当时，这《平复帖》为清朝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所藏。酷爱书法的张伯驹立刻被这举世珍品所吸引，他驻足良久，悉心观赏。

此帖是牙色纸本，高7寸5分，阔6寸，纸色邃古，有纹隐起，像琴上的断纹。帖上有字9行，共85字，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题签，下钤双龙圆玺，前后嵌“宣和”、“政和”印玺。还有楷书“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士衡（陆机字）书”11字。此外，尚有明韩世能、董其昌，清梁清标、安岐等收藏印。此帖曾入清皇宫，归乾隆之母孝圣宪皇后，再后归成亲王永理。

同治、光绪间传入恭亲王府。

据宋徽宗《宣和书谱》著录：此帖作于晋武帝初年，比晋王右军（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五六十年。字体是从汉隶转为草书的初草，也就是我们通称的章草最早的写法。笔法刚劲古朴，犹存隶法。它是书法由汉晋向唐代过渡的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对我国自晋而下的书法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这幅书法真迹给张伯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6年，即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张伯驹在上海听说溥心畬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忧心如焚，他急忙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说明这张画的重要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出国外。谁知当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时，此画已被人带走，转卖英国。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使他非常担忧，深怕《平复帖》再被古董商盗卖到外国。

张伯驹托人到溥心畬家商量，希望《平复帖》不要再流出国去，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但是溥心畬表示：当时不需要钱，如果实在要买，需出价20万大洋。这对张伯驹来说是一笔巨款，他实在拿不出，不过他达到了一个目的，亦即在溥心畬那里备一下案，以免宝物再被外国人买走。

1937年，在“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又勾起了对《平复帖》的思念。他特意委托张大千到北平致意溥心畬，表示愿出6万大洋收《平复帖》。但溥心畬执意要20万大洋，因而未成。

这年夏天，张伯驹从上海来到北平。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暂时回不了上海，只好在平津之间奔波。1937年末，他听

说溥心畬母亲去世，正急需钱款。这是一个好机会，张伯驹委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做中人，最终以4万元大洋将《平复帖》收来，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为此他变卖了夫人潘素的首饰。

每每看到这幅帖，张伯驹就会想到傅增湘的大力相助。没有傅的从中周旋，这件事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傅增湘和张伯驹是多年的朋友，每年清明时节，他们必相约去北平西郊大觉寺看杏花。大觉寺有两个亭子，一名倚云，一名北梅。他们常坐在亭上联句。傅增湘去世时，张伯驹抚今追昔，为之书挽联一副：

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忆同观《平复帖》；

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重上倚云亭。

《平复帖》收来以后，张伯驹倍加小心，护爱有加。当时，有个叫白坚甫的古董掮客，为日本人盗买了大量中国的珍贵文物，其中有颜真卿手书《告身帖》。日本人听说《平复帖》已被张伯驹购得，便委托白坚甫从中做说客，欲出价30万元大洋收买此帖。这种见利忘义的事是张伯驹所不齿的，他毅然拒绝，说：“我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浩然正气，铿锵语言，表现出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从那以后，张伯驹在北平蛰居4年多，深居简出、保护此帖。以后，因时局动乱，北平沦陷，他怕收藏的这些珍宝被日寇或暴徒抢去，便偕妻从北平去西安。为安全起见，他把《平复帖》缝藏在衣被中。经过多少跋涉、离乱，他都如性命一样地保藏此帖。直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他才携带自己珍藏的所有书画回到了北平。

1941年，大汉奸汪精卫手下一个师长丁锡山，为了敲诈勒索，在上海将张伯驹绑架，索款300万元去赎。张夫人潘素到处哀告，一时哪里能筹集到这笔巨款？不久，丁锡山派人通知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见。潘素见到张伯驹时，他已憔悴不堪，可他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却悄悄关照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他对国宝之爱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这时有人劝潘素，为了救人，卖字画筹款，潘素遵照张伯驹的意愿，宁死不动一件字画。后经潘素到处求告，在京沪各界的帮助下，花了40万大洋才将张伯驹赎回。

《游春图》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所作的一幅山水画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绘画，原为宫廷宝物，后散落出宫，辗转流入琉璃厂商人之手。商人将此居为奇货，准备运往国外，高价出售。

张伯驹得知后，四处托人洽谈购买，谁知商人竟索价黄金240两。为购得这件稀世珍品，他以超人的气魄，将自己的房产卖掉，得黄金220两，又借了20两，才将此画买到手。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闻讯，由南京专程赶到北平，出高价四五百两黄金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却说：“贵贱我不卖，我要保存。”使张群无趣而归。

1956年，张伯驹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与夫人共商，从30年蓄藏的书画名迹中挑选出8件精品无偿捐赠给国家，以偿夙愿，其中有西晋陆机书《平复帖》、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书《自书诗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这些稀世国宝，现在都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